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 發展與挑戰

王家英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was established in September 1990 to promote multi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on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emphasi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the reciproc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and the Asia-Pacific region.

Director : Yeung Yue-man, PhD(*Chic.*),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ssociate Director : Lau Siu-kai, PhD(*Minn.*), Professor of Sociology

HK\$15.00
ISBN 962-441-110-7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
發展與挑戰

王家英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亞太研究所

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

發展與挑戰

作者簡介

王家英博士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前言

香港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主權後實踐的「一國兩制」，是一新生的概念，當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將有關概念正式訂定為九七年後香港的憲政基礎之初，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對這新生的概念能否有效落實，明顯懷有不同程度的疑慮。¹

無論如何，疑慮歸疑慮，時間悠忽，自九七年七月一日至今，香港已回歸近三年。在這三年中，究竟「一國兩制」是否有效落實呢？而在落實的過程中，又遭遇到些甚麼挑戰或困難呢？要回答有關問題，瞭解香港市民的看法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角度。有鑒於此，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一九九八年四月開始，便籌劃就這一課題進行每半年一次的定期電話民意調查。迄今為止，有關調查已進行了五次。²本文旨在從調查者的角度，系統地分析這橫跨近三年回歸經驗的五次調查結果，以求能客觀準確地呈現出香港市民對回歸以來「一國兩制」實踐的複雜看法和變化，並在這基礎上探討今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所可能面對的一些挑戰。

「一國兩制」實踐的意涵

從概念上看，「一國兩制」在香港是否能夠得到落實，有兩個基本條件必須得到滿足，一是作為中央政府的北京信

© 王家英 2000

ISBN 962-441-110-7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守承諾，對香港內部事務不加干預，使「一國兩制」中香港的制度確實能按其內部需要而自主地運作；另一是香港特區政府在取代已撤退的港英政府的同時，能展現出高度自治的能力，落實有效管治，如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所期待地為香港社會帶來繁榮和穩定。³簡言之，「一國兩制」的落實必須同時兼具北京政府不干預政策的貫徹和特區政府的有效管治，二者任缺其一均會對「一國兩制」造成不同程度的傷害。故此，在瞭解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態度時，同時探討他們對這二者的看法絕對是勢有所需的。

然而，必須指出，由於中國大陸與香港這兩套社會制度的並行不悖乃覆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國」之下，所謂「覆巢之下必無完卵」，香港的「一國兩制」除了仰賴北京中央政府貫徹不干預政策以作為其實踐的必需基礎之外，它的運作同時也無可避免地會受到大陸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更清楚的說，中國大陸任何重大的政經變動，必然會直接或間接地衝擊到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運作。⁴因此，要探討香港民意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態度與信心，自然也應瞭解他們對中國大陸的政經發展和前景的評估。

此外，對北京而言，「一國兩制」不僅是解決香港回歸問題的一種重要的制度設計，而且也是解決海峽兩岸和平統一問題的既定模式，⁵因此，香港民意如何看待「一國兩制」實踐在兩岸和平統一所可能產生的意義，無疑也是觀察「一國兩制」是否成功的一個重要的角度。當然，有關的角度在很大程度上只是香港市民從其自身經歷的制度經驗看兩岸和平統一問題，並不必然直接反映「一國兩制」在香港實踐的成敗（香港市民可以滿意「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但同時並不認為「一國兩制」可應用於台灣），更不必等同大陸或台灣人民的取向。⁶不過，「一國兩制」既牽涉到兩岸統一政治的攻守互動，而香港又是兩岸關係的一個特殊組成部

份，瞭解香港市民對此的看法，相信也應有助於兩岸之間的溝通與觀點的平衡。⁷

最後，「一國兩制」能否穩定發展，也與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問題息息相關。⁸尤其是對中國的信心方面，可以這樣說，香港市民對中國越認同，其對「一國」的信心越強。如前所說，若然香港市民對北京中央政府有足夠的信心，他們在落實「一國兩制」時，也較容易以合作互惠而非懷疑對抗的態度推動「兩制」的發展與互動。但與此同時，需要注意的是，香港市民對中國的認同過強，也有可能腐蝕他們對維持「兩制」並行不悖的堅持，最後使「一國兩制」的落實受損。換言之，香港市民的中國認同與香港認同之間能否取得適當的平衡，實牽動到「一國兩制」的健康發展。

綜上所述，若要較全面地探討回歸後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態度，我們必須照顧到下面四個層面：（一）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與特區政經前景；（二）中國政府的管治能力（包括其治港政策）和大陸的政經前景；（三）香港的「一國兩制」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影響；（四）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前面所說的電話民意調查，便是根據這四個層面而設計的。下面我們將就有關的五次調查結果按這四個層面逐一作出描述和分析，然後再就其展現出的特殊趨向作出總結和討論。

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與特區政經前景

特區政府各項施政的滿意度

調查把特區政府的施政分為八個重要項目：房屋、教育、福利、經濟、大陸與香港關係、香港與台灣關係、言論和集會自由及民主政治發展。這八項施政涵括經濟、政治、民生和兩岸三地關係四大層面。表一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

表一：特區政府各項施政的滿意度（%）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處理房屋問題的表現					
不滿意	45.7	46.9	38.8	55.4	44.1
普通	36.4	31.2	29.5	21.9	26.1
滿意	12.0	13.0	20.7	14.5	22.1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5.9	8.9	11.0	8.3	7.7
推廣教育的表現					
不滿意	46.5	43.7	36.1	43.0	40.5
普通	29.5	27.5	25.5	27.0	26.1
滿意	17.4	20.9	28.3	24.0	24.3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6.7	7.9	10.1	5.9	9.1
改善市民福利的表現					
不滿意	44.0	43.8	34.8	46.4	36.6
普通	34.1	30.8	31.2	28.9	32.0
滿意	16.5	19.3	27.2	19.0	24.7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5.4	6.1	6.9	5.8	6.7
促進經濟發展的表現					
不滿意	38.1	39.6	33.2	52.7	48.7
普通	38.2	27.8	31.9	24.8	25.2
滿意	20.6	26.7	26.6	15.5	17.6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3.1	5.8	8.3	7.1	8.5
處理大陸與香港關係的表現					
不滿意	30.6	31.0	21.7	15.3	17.1
普通	38.0	30.5	29.5	29.9	30.0
滿意	23.9	29.1	36.9	43.5	42.2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7.4	9.3	11.9	11.2	10.7

表一：特區政府各項施政的滿意度（續）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處理香港與台灣關係的表現					
不滿意	27.8	27.1	18.3	19.5	22.1
普通	35.8	30.5	29.7	29.0	26.0
滿意	16.9	18.0	22.4	21.8	20.2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19.6	24.4	29.5	29.7	31.6
處理言論和集會自由的表現					
不滿意	28.4	29.2	19.9	27.4	28.3
普通	33.7	29.9	28.8	24.2	25.2
滿意	32.8	34.0	42.8	42.1	38.8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5.0	6.9	8.5	6.3	7.7
處理民主政治發展的表現					
不滿意	30.0	32.3	27.3	29.5	30.5
普通	37.7	32.8	30.2	30.7	29.5
滿意	23.3	23.6	28.7	27.9	27.0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9.0	11.3	13.8	11.9	13.0

的八項主要施政的態度展現了兩大特色：（一）除了處理大陸與香港關係的表現和處理言論和集會自由的表現兩項外，市民對其餘六項施政的表現，絕大多數時候感到不滿多於滿意。即使是處理大陸與香港關係的表現一項，在最近這兩次調查中，不滿意的人數也超過滿意的人數。（二）除了促進經濟發展的表現一項外，市民對其餘七項施政的表現的不滿情緒均出現不同程度的反覆尋底的現象，反映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施政滿意度有每況愈下的趨勢。結合這兩項發現看，

可以這樣說，整體而言，在回歸後的三年中，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各項施政，不論經濟、政治或民生，均乏善足陳，而且多有反覆惡化之象。究其原因，起碼有二：（一）亞洲金融風暴引發香港經濟嚴重衰退，失業率持續高企不下，民生凋弊，民怨自然輾轉上升。（二）在這過程中，新建立的特區政府一方面對香港政治採取了保守的態度，使對民主政治有憧憬的人士感到壓抑，另一方面在房屋、教育、醫療、福利、經濟等領域急於求成，推動一連串重大改革，但成效未見，大型行政失當卻不斷發生，益增添市民的不滿。⁹

特區政府及各個機構／組成部份的滿意度

在對特區政府各個機構／組成部份的滿意度上，調查的觀察指標也有八項，即：公務員的表現、廉政公署的表現、立法會的表現、行政會議的表現、司法制度的公正性、特首董建華的表現、特區政府的整體表現及特區政府的可信任度。在這八項指標中，公務員和廉政公署是香港過去賴以建立廉能管治的兩大支柱，有特殊意義；立法會、行政會議、司法制度和特首董建華所代表的則是特區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機構；而特區政府整體表現和特區政府的可信任度二項主要是要從整體的角度觀察特區政府的認受性。

表二透露，相對於前述具體施政項目的表現，特區政府及其各個機構／組成部份在市民心目中的表現，較沒有那麼差劣。首先，只有立法會、行政會議、特首董建華和特區政府整體的四項表現，長期出現不滿的人數多於滿意的情況。其餘四個特區政府機構／組成部份／公信力均持續獲得市民不錯的評價，當中尤以廉政公署的表現最受肯定，滿意的市民長期高達七成，顯示市民對香港的廉政工作仍有高度的信心。此外，市民對香港司法制度的公正性也頗具信心，滿意的人數持續遠遠拋離不滿的人數。¹⁰ 顯而易見，在對政府各項

表二：特區政府的滿意度／可信任度（%）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公務員的表現					
不滿意	21.8	25.7	21.9	23.6	19.9
普通	38.5	36.4	35.2	33.5	33.6
滿意	30.9	24.1	30.6	31.2	34.1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8.9	13.8	12.2	11.7	12.4
廉政公署的表現					
不滿意	3.2	4.2	3.6	2.8	5.3
普通	16.6	13.2	12.8	13.3	13.7
滿意	70.7	69.6	71.2	69.3	68.2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9.5	13.0	12.5	14.6	12.9
立法會的表現					
不滿意	26.5	31.7	25.7	28.4	40.3
普通	41.6	36.3	35.8	32.8	24.0
滿意	18.9	18.1	23.6	22.0	17.0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13.0	13.9	14.9	16.8	18.7
行政會議的表現					
不滿意	25.4	29.0	24.1	30.0	24.2
普通	39.4	34.6	31.1	30.9	29.7
滿意	14.2	15.1	20.7	14.9	15.1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21.1	21.4	24.2	24.2	31.0
司法制度的公正性					
不滿意	20.1	27.1	24.5	13.1	18.0
普通	29.6	22.0	22.3	22.9	22.6
滿意	41.6	38.1	42.2	52.0	46.5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8.8	12.9	11.0	12.0	12.9

表二：特區政府的滿意度／可信任度（續）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特首董建華的表現					
不滿意	34.2	37.4	25.7	34.0	22.6
普通	42.3	35.6	41.9	36.2	40.8
滿意	19.0	21.2	25.9	23.4	29.7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4.3	5.7	6.5	6.5	6.9
特區政府的整體表現					
不滿意	31.9	32.6	19.4	32.8	25.4
普通	41.7	37.3	43.2	39.4	39.2
滿意	23.3	25.2	31.6	24.5	30.5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3.1	5.0	5.7	3.3	4.9
特區政府的可信任度					
不信任	18.4	20.7	13.2	18.1	14.6
普通	29.7	27.7	24.8	24.5	21.1
信任	44.0	41.9	50.3	48.6	54.1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7.8	9.8	11.6	8.8	10.2

施政失望的同時，市民的不滿似乎較集中於以董建華為首的行政機構和以社會各界精英為主體的立法機構，但並未波及司法制度和一些特別部門如廉政公署。尤須注意的是，儘管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整體表現頗為不滿，尤以過去一年為然，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感，信任特區政府的人數持續超越不信任的人數一倍有多，而且相當穩定。簡

言之，市民雖對特區政府及其施政有不同程度的不滿，但並沒有嚴重衝擊到他們對廉政和法治的信心，也沒有動搖到他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這對特區政府今後爭取自我改善、重挽民意支持保留了重要的基礎。

香港的政治與經濟前景

對於香港的前景，調查主要把它分成兩個方面來看，即香港的政治前景和香港的經濟前景。由於政治和經濟乃任何社會繁榮安定的基石，而二者又不必等同，分開詢問應有助我們深入瞭解當香港市民前瞻未來時，對經濟和政治可能存在的不同看法。

表三顯示，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對香港的政治前景持續表現出相對樂觀的態度，但對經濟前景，則出現由相對悲觀到相對樂觀的擺動。市民對政治前景的相對樂觀看法，可能是基於回歸以來香港政治形勢並無發生重大變故，使得他們在回歸前的政治憂慮大大地得到紓緩，¹¹ 對政治前景的樂觀情緒也因此而迅速上升。相反，回歸之後，香港經濟隨著亞洲金融風暴而跌入谷底，至今仍只在復甦邊緣徘徊。影響所及，市民對經濟前景自不免出現由悲觀到樂觀的擺動。就這一點而言，只要香港經濟能回復穩定增長，市民對經濟前景相對樂觀情緒應會得到維持以至進一步增強。

中國政府的管治能力與大陸的政經前景

對於中國政府的管治能力與大陸的政經前景，調查也如前述香港部份一樣，把它分成三個方面來觀看：（一）中國政府各項施政的滿意度；（二）中國政府和領導人的滿意度；（三）大陸的政經前景。

表三：香港的政治與經濟前景（%）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香港政治前景					
不樂觀	30.4	27.7	24.1	32.4	26.3
普通	21.6	19.8	21.2	18.7	20.9
樂觀	40.5	43.0	45.5	41.7	43.3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7.4	9.4	9.2	7.2	9.5
香港經濟前景					
不樂觀	30.5	27.6	30.8	45.1	43.6
普通	27.4	19.7	21.9	17.5	17.6
樂觀	36.8	45.5	39.4	31.1	29.1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5.3	7.2	8.0	6.4	9.7

中國政府各項施政的滿意度

在中國政府施政的滿意度方面，有鑒於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具體的施政內容較為陌生的事實，¹² 調查只粗略地將中國政府的施政分為三個範疇處理：大陸的民主政治發展、大陸的經濟發展和香港事務。前兩個範疇針對中國政府在大陸的一般施政表現，而第三個範疇則旨在反映其處理「一國兩制」的表現。

表四顯示，近半數香港市民對北京中央政府處理大陸民主政治發展的表現持續地感到不滿，而感到滿意的只屬少數。至於他們對北京中央政府處理大陸經濟發展的表現的態度，則適適相反，滿意的人數遠多於不滿的人數。與此同時，他們對北京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也是滿意遠多於

表四：中國政府各項施政的滿意度（%）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處理大陸民主政治發展的表現					
不滿意	48.5	46.7	42.1	48.7	47.5
普通	26.1	23.5	23.3	22.2	19.6
滿意	14.9	18.0	18.0	15.2	17.6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10.4	11.8	16.6	13.8	15.3
處理大陸經濟發展的表現					
不滿意	11.8	10.6	13.6	17.3	14.2
普通	32.8	25.2	23.0	23.5	25.1
滿意	46.8	53.8	49.5	48.6	47.3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8.4	10.5	13.9	10.6	13.5
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					
不滿意	21.8	26.2	15.3	20.6	14.9
普通	34.5	28.2	27.7	22.5	26.3
滿意	37.6	38.4	46.6	47.9	47.8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6.2	7.2	10.5	9.0	11.1

不滿；但值得警惕的是，這種滿意的情緒過去一年來有減退的跡象，背後原因可能是期間北京政府對大陸與香港的關係和香港與台灣的關係作出了一些敏感性的舉動，從而引起香港市民某種程度的疑慮。¹³ 無論如何，撇開這輕微的變動，上述的趨向並不難理解：一方面，回歸後中國政府並沒有特別公開干預香港內部的運作，¹⁴ 而且中國大陸的經濟近年也發展得相當快速和穩定，兩者自然會或多或少地增加市民對這兩項施政的好感。但另一方面，中國大陸至今仍維持一黨

專政，威權主義政治體制並沒有太大改變，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程度仍然與西方成熟的民主社會相去甚遠，對此香港市民也十分清楚，不會給予超乎常情常理的評價。¹⁵

中國政府的滿意度

在中國政府的滿意度方面，我們選擇了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表現、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表現、人大委員長李鵬的表現、中國政府的整體表現和中國政府的可信度五項指標。這五項指標明顯是偏重對中國領導人的評價，而這樣的選擇主要是考慮到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的組成並不太熟識，而且中國大陸畢竟仍偏向於人治，選擇中國政府當前三位最高領導人以瞭解香港市民對他們的滿意程度，應更能有效反映出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的認受性。雖然如此，我們同時保留了中國政府的整體表現和中國政府的可信度兩個項目，藉此平衡我們對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的整體認受性的評估。

從表五可見，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對江、朱兩位中央領導人的表現持續感到相當的滿意，而二人中又以對朱鎔基的滿意程度更見強烈，這可能與自朱氏一九九八年當選國務院總理後在媒體上揮灑自如的表現有關。¹⁶ 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對李鵬的表現則頗為保留，而這應該是因為李鵬與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存有緊密關係，以及一直以來他表現得較為保守拘謹。雖然如此，隨著李氏在一九九八年從國務院總理轉任人大委員長後漸減少了在媒體出現的頻次，以及香港市民對「六四事件」漸見淡忘，過去一年來他在香港市民的負面形象已有所減退。至於對中國政府的整體表現，香港市民也頗為肯定，滿意的人數一直遠多於不滿的人數，但最近一次調查的滿意度則有下降跡象，值得注意。最後是對中國政府的信任度，這裏必須一提的是，在回歸前，對中國政府表示信任的香港市民平均不到兩成，¹⁷ 但回歸以來，信任中國政

表五：中國政府的滿意度／可信任度（%）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表現					
不滿意	10.3	9.1	8.4	8.5	9.9
普通	33.5	27.7	28.7	26.7	28.5
滿意	47.0	52.2	47.9	50.4	45.3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9.3	11.0	14.9	14.4	16.4
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的表現					
不滿意	5.3	3.8	2.4	3.3	5.0
普通	18.3	13.9	12.3	16.0	15.1
滿意	68.0	73.2	72.2	66.5	62.4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8.5	9.0	13.1	14.2	17.6
人大委員長李鵬的表現					
不滿意	39.0	36.4	43.0	42.9	45.6
普通	31.0	30.5	25.4	26.3	25.7
滿意	9.5	12.0	9.3	10.3	8.5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20.4	21.0	22.3	20.5	20.3
中國政府的整體表現					
不滿意	20.2	17.8	17.5	18.3	16.0
普通	39.0	35.1	31.3	31.1	33.6
滿意	35.4	40.5	40.6	44.1	40.2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5.4	6.6	10.6	6.5	10.3
中國政府的可信任度					
不信任	25.9	24.9	20.1	27.4	23.8
普通	31.7	27.6	27.4	25.1	25.7
信任	34.5	37.5	38.2	37.7	37.9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8.0	9.9	14.4	9.9	12.6

府的市民的人數卻遠多於不信任的人數，而且情況穩定，這樣快速的變化，相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回歸後中國政府大致維持了其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沒有對特區政府的運作作出嚴重的公開干預，而且大陸經濟發展良好，政治也相對穩定，因此贏得了不少香港市民的信任。

中國的政治與經濟前景

對於香港市民對中國大陸前景的看法，調查也如觀察香港部份一樣，把它分成兩大方面來看，即中國大陸的政治前景和中國大陸的經濟前景，而原因也大致相同。

表六顯示，回歸以來，香港市民對中國的政治前景和經濟前景持續地感到相當樂觀，而二者之中又以對經濟前景的樂觀情緒極為強烈，過去一年來更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香港市民對中國大陸經濟前景表現出較強烈的樂觀情緒並不難理解，因為如前所述，過去數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有不錯的表現，故此他們前瞻未來時，也自然會產生較美好的憧憬。但對中國大陸的政治前景也展現出頗樂觀的看法，似乎便多少與前述發現他們較不滿意中國政府處理中國大陸民主政治發展的表現有矛盾之處。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香港市民儘管對當前中國大陸的民主政治發展現狀不滿，但近年中國政府也表現出日趨開明的形象，而且中國內部政治大抵能維持穩定，因此他們對中國政治前景便漸漸產生較多的信心和較樂觀的期許。

「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影響

至於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影響的看法，調查探討的層面包括：（一）回歸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有否落實；（二）回歸後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對兩岸和

表六：中國大陸的政治與經濟前景（%）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中國大陸政治前景					
不樂觀	21.1	15.5	17.5	18.0	19.1
普通	21.9	19.3	19.9	17.5	20.7
樂觀	48.5	55.9	48.8	52.0	47.4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8.5	9.3	13.8	12.5	12.8
中國大陸經濟前景					
不樂觀	10.6	8.0	12.3	14.8	13.0
普通	13.1	13.3	14.3	13.6	15.7
樂觀	71.9	72.7	63.1	63.0	60.7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4.3	6.0	10.3	8.6	10.7

平統一的影響；（三）中國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影響。第一個問題是針對「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第二和第三個問題則是針對香港市民對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在兩岸和平統一所起的作用的主觀判斷。

從表七中，我們可以發現，香港市民對回歸後「一國兩制」的落實較持正面的態度，認為有落實的人數持續大幅高於認為沒有落實的人數。但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認為有落實的市民只在四成至五成之間，仍有一成半至兩成和兩成至三成的市民分別認為沒有落實和普通，顯示有不少的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落實仍有不滿或不足之處。（二）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調查顯示持正面態度的人數有顯著回落的情況，二零零零年四月的調查雖有所改善，但相對於一九九八

表七：「一國兩制」的實踐與影響（%）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香港回歸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有否得到落實					
沒有落實	20.2	24.3	15.7	17.7	14.5
普通	30.2	27.3	28.3	21.4	28.0
有落實	44.0	40.1	47.1	51.1	46.7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5.5	8.3	8.9	9.8	10.9
回歸後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影響					
負面影響	13.4	11.0	8.2	9.5	9.1
沒有影響	42.2	39.2	36.4	37.9	33.0
正面影響	32.4	32.4	39.4	36.7	41.6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12.0	17.4	16.0	15.9	16.4
中國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影響					
負面影響	17.2	13.8	9.4	11.1	9.6
沒有影響	38.4	35.4	33.8	36.7	31.9
正面影響	32.0	34.1	38.9	37.3	40.4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12.5	16.8	17.8	14.9	18.2

年十月調查的數字，仍然有所距離，反映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的落實的看法已沒有回歸之初那樣樂觀。

至於回歸後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和中國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影響，不約而同地有較多的市民持正面的態度，而且兩者結果相近，但相對於他們對「一國兩制」在香港有否落實的態度，則樂觀情緒稍減。還

須指出的是，市民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和中國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對兩岸和平統一的影響的正面態度，出現緩慢但持續減弱的趨勢。這一方面可能是他們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漸趨保守有以致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過去三年來台海關係波濤起伏，使得更多市民懷疑香港經驗對台灣的適用性。

身份認同

在身份認同方面，我們詢問的方式是在論及個人身份時，被訪者會認為他們自己是香港人多於中國人、中國人多於香港人或兩者一樣。從表八可以看見，回歸以來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身份認同無疑出現持續增強的趨勢，而他們的香港人身份認同則出現持續的減弱。考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回歸之後中國政府大致能恪守「一國兩制」的原則，從而增加了市民對中國的信任和認同。（二）中國綜合國力近年持續增強，而香港則處於經濟低谷，在此消彼長之下，香港市民過往的自我優越感開始減退，中國認同逐步增強。

表八：身份認同（%）

	2000年 4月	1999年 11月	1999年 4月	1998年 10月	1998年 4月
香港人	52.9	56.3	55.6	57.2	54.8
中國人	37.3	31.0	28.3	29.4	28.6
兩者都是	6.7	6.9	7.7	8.6	9.7
兩者都不是	0.6	0.8	0.8	0.4	1.4
不知道／不清楚／拒答	2.4	4.9	7.6	4.4	5.5

（三）回歸後特區政府相應增加了香港市民的中國公民教育，這也有助香港市民對中國的認識以至認同。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所謂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持續增強畢竟是相對的，目前而言，香港市民對香港的認同仍遠超於其對中國的認同，故此有關的身份認同的微妙變化，應不致嚴重衝擊到香港市民對貫徹「一國兩制」的堅持。

結論和討論

本文根據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於回歸後進行的五次半年度電話民意調查結果，探討了過去近三年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態度和變化。本文的主要發現包括：

（一）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各項施政普遍感到不滿，而且除經濟一項的不滿情緒近一年有所紓緩外，其餘各項施政的不滿情緒甚至呈現反覆惡化的趨勢。

（二）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廉政工作和司法公正的維持頗為滿意，但對行政會議、立法會、特首董建華和特區政府的整體表現卻持續地傾向不滿。雖然如此，有關的不滿並未動搖到他們對特區政府的相對信任。

（三）香港市民對香港政治前景持續地表現出相對樂觀的態度，但對香港的經濟前景，則跟隨香港經濟的客觀變化而在悲觀與樂觀之間擺動。

（四）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處理大陸民主政治發展的表現持續地感到不滿，但對於中國政府處理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的表現和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則持續地抱持頗為滿意的態度。不過，對處理香港事務表現的滿意度，過去一年有減退的跡象。

（五）香港市民對國家主席江澤民和總理朱鎔基的表現一直相當肯定，而且對中國政府的整體表現不僅頗為滿意，

對它也有一定的信任，唯一例外的是對人大委員長李鵬的表現有相當的保留。

（六）香港市民對中國的政治前景和經濟前景持續保持樂觀的看法，而二者之間又以對經濟前景的樂觀情緒較為強烈，過去一年更有進一步上升的趨勢。

（七）香港市民持續地傾向認為回歸後「一國兩制」得到落實，並持續地傾向認為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和中國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經驗對兩岸和平統一有正面的影響，但有關的肯定態度不約而同地出現緩慢減弱的趨勢。

（八）香港市民的中國人認同有持續增強之象，而他們的香港人認同則持續減弱，但目前而言，香港市民的香港人認同仍遠較其中國人認同強烈。

綜合上述的八點發現，可以這樣說，從民意的角度看，回歸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大致上屬於正面，香港市民多傾向認為「一國兩制」得到落實，也認為中國政府能貫徹其對「一國兩制」的承諾。但與此同時，香港的「一國兩制」亦存有不少的隱憂或挑戰，包括：

（一）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各項施政的不滿持續高企不下，影響所及，他們對特首董建華、行政會議、立法會和特區政府整體也多有怨言。這不僅對特區政府認受性的建立帶來沉重的壓力，對特區政府政策的推行，也勢必構成重重障礙。

（二）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的信心與認同很大程度建基於中國大陸經濟的高速發展和政治的相對穩定，一旦這兩項條件出現變化，他們有關的正面態度便隨時有逆轉的可能。問題是，中國大陸畢竟是一發展中的社會，未來經濟和政治發展仍存有頗多的變數。香港市民對此的樂觀情緒，可能只源自他們對中國大陸發展的表面觀感而非理性把握。故此若然有關的表象出現突變，他們的情緒很容易從過度樂觀的一

極擺向過度悲觀的另一極，從而對「一國兩制」的維持造成嚴重的衝擊，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的爆發對中港兩地的關係造成嚴重的傷害，可謂前車可鑒。

（三）香港市民對中國政府處理香港事務的表現的滿意度有減弱的趨勢，相信也因為如此，他們對香港「一國兩制」的落實及其在兩岸和平統一的作用，均漸有保留。有關趨向的呈現，似乎透露出在香港市民的心目中，中國政府對香港事務有加強干預之勢，故此他們對「一國兩制」的落實及其種種作用，漸生疑慮。

總言之，要繼續有效落實「一國兩制」及發揮其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重要作用，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無疑必須針對上述三點挑戰或隱憂，盡早作出改善之道。

註釋

1. Robert Cottrell, *The End of Hong Kong* (London: John Murray, 1993).
2. 此調查系列的抽樣方法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從最新的香港住宅電話簿（英文版）中隨機抽出若干個電話號碼；為了使未刊載之住宅電話號碼也有機會被選中，我們將已抽選的電話號碼最後的兩個數字刪去，再配上由電腦產生的隨機數字，成為是次調查的樣本。第二步，當成功接觸住戶後，再用出生日期抽取其中一名十八歲或以上的家庭成員作為訪問對象。首次調查於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至二十一日進行，共訪問了 1,003 人（十八歲或以上成年市民，下同）；第二次調查於一九九八年十月十三至十五日進行，共訪問了 932 人；第三次調查於一九九九年四月八至十日進行，共訪問了 891 人；第四次調查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十七至十九日進行，共訪問

了 783 人；最新的調查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二十五至二十八日進行，共訪問了 777 人。

3. Michael Yahuda, *Hong Kong: China's Challenge*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135-142.
4. Jamie Allen, *Seeing Red: China's Uncompromising Takeover of Hong Kong* (Singapore: Butterworth-Heinemann Asia, 1997), pp. 1-36.
5. 參看八十年代初以來北京對台政策文件。
6. 例如，絕大多數台灣人民對「一國兩制」作為兩岸和平統一的解決方法，明顯地抱持否定的態度。見葉明德，〈民意調查與港澳問題〉，載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合編，《兩岸關係問題民意調查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1997），頁 5-1-14。
7. Timothy Ka-ying Wong, "Hong Kong's Policy Possibilities and Directions toward the Mainland-Taiwan Confli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7, No. 19 (1998), pp. 383-403.
8. Timothy Ka-ying Wong, "Civic Aware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Hong Kong: A Survey of Popular Opinion,"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XII, No. 2 (1998), pp. 452-487.
9. Siu-kai Lau,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Political Support for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4, No. 3 (1999), pp. 352-371; Timothy Ka-ying Wong, "The Legitimacy Problem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Challenge and Response," *Issues and Studies*, Vol. 35, No. 4 (1999), pp. 55-85.

10. 在回歸前，香港市民對港英殖民政府的信任度平均只在三成以下。見 Siu-kai Lau,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Leaders and Political Disengagement," in Siu-kai Lau et al. (eds), *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Hong Kong 1995* (Hong Kong: Hong Kong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7), p. 119.
11. Timothy Ka-ying Wong, "The Legitimacy Problem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pp. 64-65.
12. 王家英，〈香港人對待兩岸三地關係的態度與變化〉，載王家英、孫同文編，《香港回歸與港台關係》（香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1997），頁127-150。
13. 這些舉動包括「人大釋法事件」、「鄭安國事件」、「王鳳超事件」和「何志明事件」等，有關事件均在香港引起不同程度的爭議或震撼。
14. Siu-kai Lau, "The Eclipse of Politics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sian Affairs*, Vol. 25, No. 1 (1998), p. 23.
15. 王家英，《過渡期香港民意與政治》（香港：田園書屋，1997），頁284。
16. 自出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以來，朱氏一直受到香港媒體所追捧，其鐵面無私的形象，也深入香港民心。
17. Siu-kai Lau, "Democratization, Political Leaders and Political Disengagement," p. 119.

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

發展與挑戰

摘要

本文根據一項定期進行的電話民意調查結果，探討了回歸後香港市民對「一國兩制」實踐的態度和變化。從民意的角度看，回歸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實踐經驗大致上屬於正面，但亦存有不少隱憂或挑戰：（一）香港特區政府的認受性相當薄弱；（二）發展中的中國大陸經濟與政治存有不少變數；（三）北京政府對香港事務似有加強干預之勢。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政府應針對這些隱憂或挑戰，盡早作出改善之道。

The Practic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Hong Kong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

Timothy Ka-ying Wo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Hong Kong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policy since Hong Kong's return to Chinese sovereignty, on the basis of the results of an on-going telephone survey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opini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practice after the return has been largely positive. Yet, the practice also faces uncertainty or challenge: (1) the legitimacy of the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remain weak; (2) the evolving Chinese economy and politics are far from stable; (3) it seem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increased its interference in Hong Kong-related affairs. The Hong Kong SAR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should take up these problems and find ways to solve them.